



中篇小说:

不断激活现实主义创作的活力

□ 窦金龙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5部中篇小说——全勇先《秘密》、肖克凡《父亲和雕像》、林那北《阳关三叠》、罗伟章《屋檐》、胡性能《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全勇先《秘密》上承中国当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传统,同时又巧妙地吸收了悬疑、谍战等类型小说的内容元素,凭借引人入胜的叙事技巧,写出了在黑暗压抑的年代里,坚定的信仰和高贵的人格如何能让个体的生命与精神得以保存。正如小说题目所点出的,“秘密”本身就包含了个人生命经验中需要主动或被动地隐蔽、潜藏的部分:一方面,“秘密”的隐蔽会逼迫人去做选择,一个人灵魂深处的质地也会在这种严酷的逼视下自然显现;另一方面,书写和记录“秘密”这一行为又隐含着一层悖论,即完成对“秘密”的揭示,才能够把那些在极端背景下蒸馏出的人性之“精华”永久地保存在文学之中。

《父亲和雕像》属于作家肖克凡耕耘数十年的工业题材小说,但作品并非直接书写工厂或工人生活,而是以一种寻找“记忆”的方式写出了“记忆”留下的痕迹以及对个体的生命塑造。小说的叙述节奏有一种当下叙事文学较为少见的沉稳和朴拙之气。作品中所散发出的这种独特气质,与小说所要塑造的如骆驼一般的“老工人”形象是一致的。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父亲的倔强甚至死板,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化育下的不争不抢却自尊自重的人格特质。对于近年来流行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叙事,肖克凡的小说提供了一种十分珍贵的、从“父辈”出发的视角:时代洪流滚过,“父辈”们没有悲情和哀怨,而自律、严谨、坚强、乐观的老工人精神则成为广场上的雕像,将品格凝结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实体。

林那北《阳关三叠》以经典的中国古琴曲为名,但小说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和紧张密集的叙述节奏,与小说标题所携带的古典气韵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阅读审美张力。小说以一把古琴为线索,既书写了几代人的家族故事,又映照出了

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历史。小说通过纯熟的艺术手法,将古琴这一“传统物”在叙事层面的作用发挥到了浑然天成的境界。“物”既是叙事的工具,也是精神的载体。小说中的古琴,从研制到弹奏再到聆听,人的高洁品性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传递;而琴本身也会凭借其“物”的主体性,在与人接触、共存、互动中,将其承载的文化基因感染于人。

罗伟章《屋檐》是一部以人世温情为底色的小说。过去的岁月自然有诸多苦涩辛酸,作者并非有意地在笔下涂抹或修改回忆的颜色,而是在敏感地意识到自己身处个体相互隔绝的当下时,努力尝试去寻回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情感联结。小说设置了两个人的对话场景,通过反衬的方式,凸显出社会发展水平与个体孤独境遇之间的“倒挂”,小说的当下介入性由此生发。小说以第二人称的讲述式口吻写成,在营造出对话“现场感”的同时,也让小说在文体上有了一层戏剧独白的审美趣味,并形成了笼罩全篇的、浓厚的抒情色彩。

胡性能《猛犸象》以“猛犸象”这一消失的远古动物来喻指小说主人公,塑造了一个正直、勇敢、充满生命能量的诗人形象。小说主人公“诗人”永葆一颗赤子之心,身体力行地用生命守护精神高地。除了塑造这一“典型人物”之外,由小说叙述者所见证并讲述的20世纪80年代精神高度饱和的文学环境,也成为小说中另一个“隐形”的主人公。小说对时代氛围充满浪漫色彩的细致还原,宛如一首献给“文学人”自己的深情的歌。

获奖作品整体上都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全勇先的小说呈现了战争年代的极致人性,肖克凡写出了工人阶级独特的品格和情感,林那北将传统文化进行了巧妙的现代赋形,罗伟章描绘了世俗场景中的日常温情,胡性能的小说是一曲对理想主义的挽歌和颂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奇曾坚定地宣称,“现实主义并非诸多风格之一,而是一切文学的基础;风格只能在其范围内或与之形成特定关系(包括对立关系)时产生”。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脉络和源泉。尽管现实主义在历史上曾被一代代新

的文学创作潮流所冲击,但是在今天现实主义文学依然以其强烈的、将文学与现实进行关联的本质诉求,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的确定性。本届获奖的5部中篇小说,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而言,不仅是简单的“回归”或“复兴”,而且在不同层面上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趋势。

第一,对于小说“讲故事”的重视。讲故事不仅是民间文学的基本样态之一,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传统,还应是小说基本的技术门槛。本届获奖的小说在“讲故事”的层面上都下足了功夫,且各具精彩。

首先,这些小说都是以一个主要的人物或意象作为作品锚定的核心,将故事紧紧围绕在这一核心周围展开。这就使得小说的叙述节奏紧凑,线索清晰。比如《阳关三叠》中那把特殊的古琴,就是小说的核心坐标,围绕着她,在时间纵向和现实横向上,展开了精彩的故事情节。《父亲和雕像》中的“伽马刀”,既是父亲当下急需治病的医疗工具,又是父亲放心不下的工厂危险品,由它牵起双重的叙述紧张感,也是小说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所在。

其次,小说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悬疑”色彩,增添了小说故事的可读性和趣味性。《秘密》讲述的就是高压条件下“秘密”的产生、隐藏和揭示的全过程,小说语言冷静但情节张力拉满;《阳关三叠》由开场神秘人的三次会面,到“偷琴”“护琴”“借琴”的紧张过程,叙述一波三折,把民间故事结构底层的“三叠式”演绎得淋漓尽致;《猛犸象》是由一封监狱来信打开回忆的入口……“悬疑”并非类型文学所独有,文学的趣味性也绝不会妨碍作品成为经典。

再次,小说主体大都以一种广义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让读者充分沉浸于故事之中。这5部小说中有的严格使用了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视角,如《秘密》《屋檐》和《猛犸象》,都将“我”的内心感受充分地融入故事进程之中,因此小说内部的情感张力都极其强烈。《阳关三叠》则是在叙述者阿庆的限知视角下展开,阿庆的体验和情绪,带动着读者走进故事之中。《父亲和雕

像》尽管使用了全知视角进行叙述,但贯穿小说深处的始终是一个稳定的父亲视角。随着全媒体时代的来临,读者的感官经验可以在不同媒介中得到体验和满足,但内心深处感受和震动,仍需要文字和语言来表达。这或许也是文学无法被其他媒介所替代之处。

第二,文本细节,尤其是“次要细节”,是小说能够动人的关键要素。小说的主要意象或细节,是形成小说主体框架的基础,但它只能让小说在一个均质的层面上完成叙述任务。真正让小说脱颖而出的,是文本中那些并非核心的“次要细节”。次要细节能够让小说突破仅仅作为思想材料的束缚,生出意外鲜活的情动。本次获奖的小说无一例外地都体现出这一层精妙韵致。

比如,“头发”就在《秘密》当中作为很容易被人忽视的次要细节,帮助小说完成了对赵一曼这一人物的塑造。小说中多次写到她的“头发”:病愈之初违背医嘱坚持洗头发、严刑审讯后头发全都湿了贴在脸上、就义前把鬓边的头发用手撩到耳后……如此细致的“观察”,既体现出赵一曼作为女性对于“美”的追求,也能体现出伟大人格中坚韧和自尊的一面,以及这种坚韧被强行折断的残酷。由此传递出的精神力量让人震撼和感动。

又如《父亲和雕像》中,写到工人生活时,有一个极其生活化的、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即工人夏天工作时出汗多,需要补充盐分,因此饭菜要咸一些。这个细节一定来自工厂生活的亲身经历。小说中经由这一细节折射出主人公李玉福与妻子之间的爱和尊重、工友之间的互助和关爱,同时又能反映出李玉福常年生活的朴素以及性格中沉默、和善的一面。这样属于味觉记忆的细节,让读者对于小说中工人群体的审美感受更加鲜活。

再如《屋檐》里写到的群租房中看电视的细节,电视的音量大小,影响着一墙之隔的朋友家庭之间的感情,但通过这一细节也写出了物质普遍匮乏的时代,不同群体之间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虽然艰苦但却可以苦中作乐的生活日常。《猛犸象》着意写到主人公许东生来自漠东北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那里虽地处南方但气候寒

凉,因此冬季才会时常下雪,“雪”成了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意象,而雪中吃火锅的经历也由此成为小说中温暖的记忆。这些“次要细节”,在小说中一方面有助于主题的表达,另一方面赋予小说某种不可复制的灵韵。

第三,小说的“确定性”来源于由小说文本结构所形成的逻辑确定性。新文学发展至今,“问题小说”“干预生活”“主题决定论”等,其实都试图将现实主义文学引入某种真理确定性之中,现实主义的创作也似乎常常只能由“写什么”来决定。本届获奖的中篇小说则提供了一种重新打开现实主义的路径,由小说结构本身来重铸一种逻辑上的确定性。

5部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形式特征:都设置了不同的时间线,以“在场”和“缺席”两种状态辩证共存的方式,形成了小说的主要结构。《秘密》设置了伪满时期、20世纪50年代和当下三条时间线。伪满时期是“秘密”发生的年代,50年代是审查“秘密”的年代,叙述当下则是“秘密”得以存续的证明;《父亲和雕像》将父辈工人年轻时的生活经历和工厂记忆与当下晚年重病入院的现状并置;《阳关三叠》在20世纪60年代古琴丢失和如今重新找到古琴之间展开叙事;《屋檐》将上一代青年人的群居生活日常和当下青年人的生活状态进行了对照;《猛犸象》的叙事不停折返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生活和90年代、21世纪以后这些不同的时间点之间。叙述的当下是一个固定“在场”的时间点,但对于“在场”的叙述,则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精神缺损状态;而叙述中“缺席”的过去,则是小说试图极力去抵达或召唤的一种曾经的“在场”,并且最终都在文本中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缺席”的“在场”。

在这些小说的整体结构当中,都有一种精神被召唤到当下。它可能来自历史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来自我们的生命经验,且它可以在文学中被唤回,以弥补或驱散我们面对世界时的迷茫、困顿或危机。这种由文学所建立的我们可以把握的精神结构,或许正是现实主义文学在今天得以重铸确定性承诺的一种方式。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短篇小说:

以独特的叙事与审美追求实现新的文学创造

□ 李蔚超

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评选中,包括10部小小小说在内的517篇作品构成的文学图景徐徐展开,新时代文学短篇小说门类的总体风貌与深层脉动渐次清晰。班宇《漫长的季节》、哲贵《彼此》、何玉茹《她和她的麦子》、储福金《不知》、艾玛《序曲》5篇作品最终脱颖而出。它们以独特的叙事与审美追求实现新的文学创造,在奔涌的时代潮流中,探寻现代人的精神栖居之路。获奖作品实现的创新、引发的思考,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新时代文学创作趋向之变化,值得深入审视。

书写普通人的时代史

短篇小说篇幅虽小,却以匠心独具、藏蕴丰盈、见微知著为旨归。因此,作家普遍将国企改革、下海经商、股市浪潮、城乡变迁、文旅新业态、新媒体迭代等40多年来的时代讯息,融入小说人物的个体生命轨迹。

获奖作品储福金的《不知》以围棋为核心意象,横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的40余载岁月,串联由体制内辞职下海、股市跌宕、网络流行文化兴起等数轮时代浪潮。两个爱棋的青年,一个是时代弄潮儿、虽“不知”但执着有为,一个是守棋自洽、静观世事的内敛旁观者,两个棋友以“手谈”谈人生。以“不知”为题表明了一种对人生、对历史的态度。作家一如既往地將时代洪流、人性抉择、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藏在方寸天地之中。

参评作品中,金仁顺《白色猛虎》把东北文旅民宿、网红经济作为故事背景,塑造了生猛泼辣、通透精明、骨子里藏着长白山风雪锻造出的倔强的女性形象。南飞雁《景区》聚焦文旅商业化时代下的景区生态:演出流程、人情往来都被流量、资本规则重新规划,昔日朴素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被商业算计层层裹挟,最终导致人的精神失重。杨通《把自己折叠起来》以现实主义笔法书写城镇化进程中村庄空心、水库污染、民俗经济兴衰等现象,个体命运在时代浪潮中载浮载沉。

孙睿《抠绿大师》以“绿幕抠图”这一新兴数字技术为核心意象,捕捉新媒体时代中城市青年虚实交错的生存图景。

尽管涉及众多时代命题,但是短篇小说大多不写宏大象征,而是把乡愁、遗憾、执念、救赎、追寻理想等主题寄托在具体的物象之上,浓缩在单个人物的行动和命运之中,形成文本独有的隐性叙事线索。未说出口的话、未赴的约定、未完成的相见,时常被作为故事的落脚点或开放式的结尾。普通人微光一般的坚韧,爆发出巨大的生命能量,成为对抗虚无的精神力量。也正是这种创作倾向,使得作家普遍热衷采用淡叙事、慢节奏、留白式书写,外部事件作为背景隐隐呈现,人物内心情绪和行为言语被细腻书写,形成一种可被称为“抒情现实主义”的短篇风格,由此发掘普通人复杂、柔软、丰富的内心。

优秀的作品总能敏锐地洞察到社会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现实命题,并赋予其审美化的表达。艾玛《序曲》作为获奖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一位盲眼老人的保姆王真身患癌症,她的儿子好朋为减轻母亲的病痛协助其自杀。最终,好朋被“判三缓四”。盲眼老人得知后,决定接好朋同住。有法学学科背景的艾玛始终懂得,时间平等对待每个生命,法律置人的尊严于平等的标尺之上,但小说要把法理之外的悲悯与温情娓娓道来。汤成难《麦田望不到边》的主角是缄默质朴的劳动者马永善。他被导演选中拍摄纪录片,体验到久违的温情与幸福,却在拍摄结束后重新堕入孤独的生活原貌之中。小说似乎提示我们,文学如何真正给予平凡人长久的温暖与精神支撑,仍是当代创作者需要审慎回应的命题。

大文学观视域下的跨界写作

大文学观的要义之一,在于打破传统的“纯文学—类型文学”“传统文学—网络文学”“文学—影视”等二元对立,将文学理解为一种开放的、流动的、与知识体系和社会生活共融互嵌的文化实践。本届评奖以大文学观为视域,力图打

破原有的认识框架,将眼光投向更广阔的文学疆域。

班宇4年来创作了一系列熔铸诗意与情感的短篇小说。他的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写的是个体在家庭陪护中的琐碎苦楚,却提炼了所有人共通的生命体验:亲人衰老、离别遗憾、亲密关系里的隔阂与亏欠、漫长等待中的精神疲惫。尽管小说与同名热播电视剧并无直接的情节关联,但班宇作为剧集的文学策划,其小说中的诗意气质、物象抒情已融入剧集的改编。剧中四季流转的镜头美学、人物与岁月和解的基调,构成了与小说一致的美学风格。而“漫长的季节”,是班宇为一代人的伤痛、释怀与成长奉上的精彩妥帖的文学修辞。

本届评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网络文学作家与跨界写作力量的参与及崭露头角。以南派三叔、蔡骏、蒋胜男等为代表的网络文学、类型写作的作家们,加入短篇小说这一重要体裁的创作队伍中,拓展了短篇小说的边界,丰富了文体风貌。蔡骏获得提名的《鲁先生传》是一篇关于记忆与文学传承的小说,在文体上别具一格,糅合了多种叙事传统与语言风格,形成了沪语文学、现代散文、悬疑叙事的混合风格。蒋胜男《女剑侠聂隐娘》以唐代传奇与藩镇历史为背景,将侠义的精神带回当代小说。南派三叔获得提名的《蝎子草中的女人》虽然探讨的是“进化—感觉—高维”主题,但其叙事框架和叙事风格,借鉴的却是非虚构写作的方法。这些作品均是从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中生长出来的。

同样,科幻小说展现出令人瞩目的跨界活力。玄鹄《桥洞下的外星人》、林檎《曼德罗分行》、陈楸帆《超载》与宝树《俱芦洲》等作品,虽共享科幻(或泛科幻)的叙事外衣,却在题材资源、美学路径与精神旨趣上各开生面,共同构成了大文学观视域下跨界写作的丰富样本。这些作品把时间感知、量子计算、预激综合征、认知科学、深度学习、算法伦理等学科话语有机地编织进文学叙事之中,聚焦的却是当代人真实的精神困境。

这些跨文体写作实践表明,文学的重心不在于某一特定的题材或风格,而在于人的创造性以及关切人的文学本身。

意象化诗意叙事

纵观本届参评的短篇小说,作家们倾向于使用一种创新性表达——弱化戏剧冲突,不直白剖析心理,构建一套以物象承载人物内心的叙事方式。外部风物、器物、空间成为人物内在孤独、执念、遗憾的镜像,作家们依托自然风物、乡土空间、人文器物构建象征意象群,使小说兼具写实性与诗性。自然物象的荣枯、新旧空间的更迭,暗合人心的聚散、理想的起落。作家们以含蓄、冲淡的书写方式克制地表达悲欢,达成现实主义底色、现代心理小说的向内叙事特质与中国古典诗意的融合,形成短篇小说独特的审美范式。

哲贵《彼此》是本届获奖作品中典型的意象叙事范本。小说搭建起多层意象:甜润的蜜与蜜蜂蛰人的痛形成对照,藏着父亲复杂隐忍的爱与一生行医的精神执念;《古文观止》是父亲文人风骨与职业信仰的具象符号,焚毁书籍则象征他晚年的自我质疑;丰盛餐桌则成为家人彼此对照、彼此对峙、彼此理解的场域。小说依托物象的变迁、场景的流转,含蓄铺展父女、姐妹间缠绕多年的误会与和解,用具象之物承载亲情纠葛与时代变迁,呈现短篇小说以物写心的诗意叙事特质。

何玉茹《她和她的麦子》以麦田作为贯穿全篇的核心意象,承载丧偶女主的精神寄托。青绿的麦苗、坚挺的麦芒、饱满的麦穗,麦子的生长节律对应着女人重建自我的心灵历程。小说将人物的精神情绪寄寓于麦子的荣枯流转,借草木生长写人心复苏,以自然物象承载普通人隐忍宽厚的生命观,虚实相融,寄至味于淡泊。

在许多优秀短篇小说中,作家们塑造了一系列精妙蕴藉的诗意意象。提名作品朱山坡《座头鲸》中,座头鲸是贯穿全篇的核心象征。它既是乡村少年挣脱闭塞、奔赴远方的出走理想,也是

人历经半生漂泊后内心渴求的精神归处。一条沙河横跨40年岁月变迁,村庄、人事、理想尽数流转,座头鲸最终化为世间一切求而不得之物的象征。提名作品刘永涛《沉默的树》核心意象是“防风林”。大舅半生独守荒漠树木,风沙侵蚀树木如同岁月摧毁他的容貌与情感,沉默的树就是他本人。大舅同无数垦边人一样,孤独、隐忍、默默付出,为边疆大地奉献终生。东君《在陶庵》里,老旧书屋常年弥漫霉斑与纸张的气息,古籍、旧书、书店是老一辈文人的精神归宿,以器物意象隐喻读书人对传统文脉绵长、朴素的执念与守护。雷默《壁虎》中,壁虎既是童年记忆符号,也是生命自愈与苦难终将消解的象征。

本届参评作品中的意象化叙事并非单纯的修辞偏好,而是一种叙事伦理的自觉选择:以物写心,以象达意,以克制书写深情,以有限蕴含无限。这一叙事路径既接续中国古典诗歌托物言志、比兴寄情的悠久文脉,又契合当代文学关切个体精神世界的创作趋向,短篇小说的边界也随之悄然拓宽。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参评作品也暴露出当下短篇小说创作中一些倾向性问题。不少作品在叙事策略、情感结构和语言风格上缺乏令人耳目一新的特质,特别是青年作家群体中尚未涌现出足以标识新一代创作主体的美学突破。而中短篇小说原本是最能展现青年作家想象力、创造力的文体,最能展现严肃文学的创新可能的领域。与前辈作家在短篇小说中完成的形式革命相比,当下的短篇小说创新更多是在既有范式内的微调,而非文体创造上的真正突破。另外,当情节推进至深层矛盾时,许多小说不约而同地选择“在爱中和解”或“戛然而止的搁置”。这种结尾方式固然体现了文学对生活复杂性的尊重,却也暴露了叙事想象力在面对现实难题时的退缩——小说不再试图在虚构中开辟解决困境的新路径,而是将难题交还给生活本身。短篇小说不应止于呈现困境,更应展现文学在困境中创造可能性的独特力量。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